



Letters
from
Nuremberg

纽伦堡来信

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

[美] 克里斯多夫·多德 拉瑞·布鲁姆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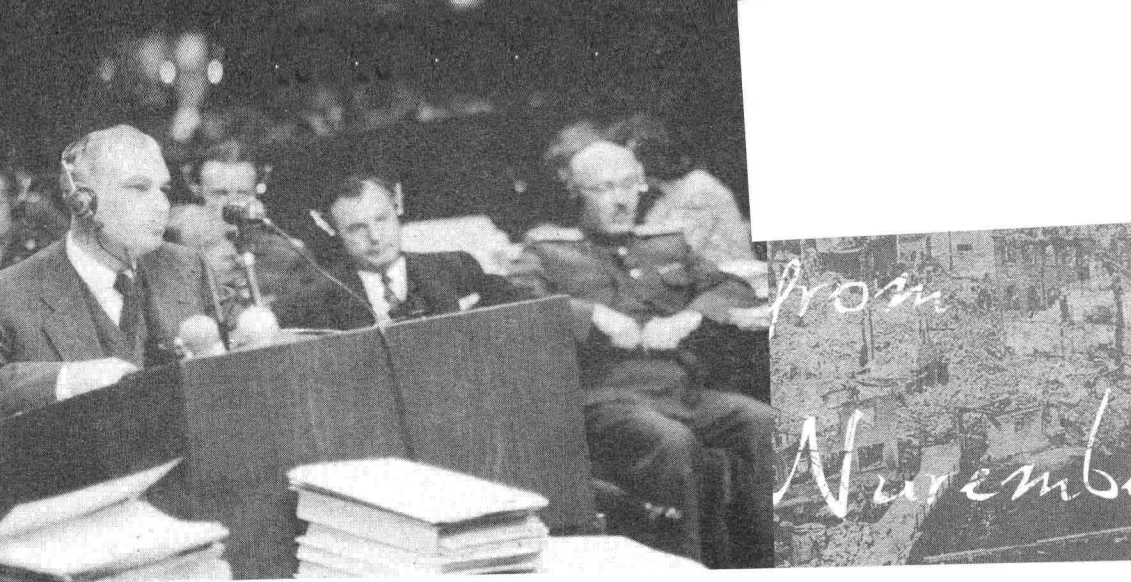
Christopher J. Dodd with Larry Bloom

李静 译

横跨道德宇宙的弧线是漫长的，但它偏向

——[美] 西奥多·帕克牧师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纽伦堡来信

爱与正义的亲密档案

[美] 克里斯多夫·多德 拉瑞·布鲁姆 著

Christopher J. Dodd with Lary Bloom

周楠 李静 译

Title: Letters from Nuremberg

Copyright © 2011 by Christopher J. Dodd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ree Rivers Pres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版贸核渝字(2012)第0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伦堡来信 / (美)多德 著; 周楠, 李静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6

书名原文: Letters from Nuremberg

ISBN 978-7-229-06541-6

I. ①纽… II. ①多… ②周… ③李… III. ①纽伦堡审判(1945~1946)—史料
IV. ①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7576号

纽伦堡来信

NIULUNBAO LAIXIN

[美] 克里斯多夫·多德 拉瑞·布鲁姆 著

周楠 李静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李 洁

特约编辑: 何彦彦

责任印制: 杨 宁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08千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洞察世界，寻路中国

知行书系缘起于我们对当下中青年知识阶层精神需求的关注。

当下中国的中青年知识阶层敏感于自身正处在多维度的过渡与转型当中，对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照角度也随之变得多维和复杂化：从世界格局说，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我们身处的社会，并深入到个人生活与选择当中，如何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甚至物种的限制，关照宏大至生态平衡、世界和平和社会公平，幽微至个人权利伸张、人性完善等命题？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角度说，如何重新审视“国”与“民”的关系，如何剔除深烙于我们心性中傲骨与奴性交织的矛盾，如何重新认识责任与权力的真义，舒展成有着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公民”？从个体角度说，国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度都空前高涨，面对的困境也是严重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社会价值标准混乱、社会阶层差距拉大，对公平正义的叩问迫切，社会各个角落弥漫诚信危机，令道德规范失序，众多个体感受到人生意义迷失，我们正经历着西方社会也曾经历的“现代性之隐忧”，如何认识“隐忧”，如何突破自身的“限制”，如何以自我的小革命为社会添加向上的力量，以在世俗和精神上都找到信仰和自在？

这些“如何”令我们寻找洞察世界的出口。我们发现，当下急需探讨的种种问题很多也曾出现于欧美社会，欧美思想家的研究较为深入，留存了不少传世的著作，给当今中国的读者以重要启示；当今国内思想文化界也活跃着不少积极的知识分子，他们探讨的范围从社会现状分析到个人精神重建的方法和方向，提出的问题切中社会与个体之要害，不少作者与作品都值得参照。

知行书系正是基于上述缘由而生，我们将尽量保有大人文的视野，从国内外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著作中探察普世价值；我们将打破地域与时代的界限，不拘学科和作者身份，深入经典与前沿，寻找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及个体处境与出路的著作。知行书系集思想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它们经典，但绝不会面目严肃、高高在上；它们会满足追求文明与自由的阅读者对各种根本问题和时代动向的追问，也可满足对创新和人生意义的探索。

基于上述的多重维度，我们通过三个子系列建构知行书系：

“经典”系列包涵中外不同时期重要学人与文化大家的著作；

“视界”系列包涵思想学术界紧扣现实意义的各种学术观点的著作，特别是中西方思想文化前沿著作；

“问道”系列遵循不拘于作者专业和身份的原则，无论哲学、历史、宗教甚至自然科学，只要观点和内容本身对当今社会在宏观和微观上有重要意义即可，它涵盖了国内外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的论著和小品。

身为编者和深度阅读者，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发现和深入地阅读，将能够深刻影响和指引我们的好书集结起来，建构成洞察世界的出口，让寻路的你我找到方向和希望。

这或许能现出知与行的真义吧。

知行书系编委会
(主编 陆建德)

在此即将开启的史上首次对危害世界和平罪所进行的审判，既是殊荣，也让重任在肩。我们试图谴责和惩罚的罪行是如此计划周密、如此恶劣、如此具有毁灭性，我们的文明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如果重复此等罪行，文明将无法生存。

——选自本书第16页

序 言

父亲三十八岁时被派去处理纳粹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1946年10月，即十五个月之后，他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返回，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转变直到五十年后他去世我都无法完全理解。

追溯到战后的那些日子，我的父亲托马斯·J. 多德和母亲玛丽·格蕾丝·多德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汤米、卡洛琳、杰里米、玛莎、尼古拉斯和我——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市协和大街63号。在这个平静的街区里，只有在我们家里才能找到一些第三帝国的遗物——一面纳粹党十字旗、一些德军头盔和奖章，而这些奖章曾被纳粹用于奖励那些尽力为党诞下纯种雅利安婴儿的母亲们。直到今天，只要想起这些东西我都会不安。然而在当时，这些东西却被视作美国及其同盟军击溃邪恶力量的战利品。

现在仔细想来，当时可能唯有我们家在阁楼里藏有能证明纳粹肆虐的黑暗年代的东西。多德家的孩子从来不许翻看这些证据，因为它们是不祥之物。父母担心这些罪证会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于是明令禁止我们进入三楼的储藏间。然而，他们应该知道，越是禁止的事情，孩子们就越想做。

经过多次偷袭，我们六个孩子将储藏间里的那些箱子翻了个底朝天。面

对发现的东西，我们也惊骇不已。在箱子里集中营的照片中，有成堆的骨瘦如柴的尸体和一些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场景。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旧的德军漫画书，尽管上面的德文我们看不懂，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漫画的目的都是将犹太人刻画成非人类，并斥责犹太人将疾病传染给了德国人。还有一些照片则记录了纽伦堡审判的关键时刻。其中一张照片给我们的印象都很深——照片上父亲向新闻摄影师们展示他控诉的证据：一个波兰囚犯干枯的头颅。

当时因为我们根本不被允许见到这些罪证，当然就不可能和父母谈论它们。在那个年代，“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字样都还未被广泛使用，且关于纳粹时期的重量级影像资料还未能公之于世。那时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些国际时事上，如朝鲜和苏联以及原子弹激增这样的事件上。

即便如此，父亲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及纽伦堡审判中的经验教训。他曾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 杰克逊领导的起诉团队中担任美国次席检察官。在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回忆起在纽伦堡的日子。他曾向我们描述那些被告，但他从不偏袒那些罪犯的罪行，也不避言那些可怖的细节。我的兄弟姐妹都能证实，父母亲想让我们在了解国际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为我们创造一个安如天堂的家庭环境。因此，纽伦堡审判的一些细节他们仍会对我们保密。

随着时间推移，我对世界的好奇心也逐年增长，关于纽伦堡审判的那些事，我总想问问父亲。毕竟，除了我父亲，还有谁认识赫尔曼·戈林、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阿尔贝特·施佩尔、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以及其他那些他口中所称的“纳粹头头”们？

当我学习法律的时候，我对纽伦堡审判的思想及其他所涉及的道德准则非常着迷。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审判像它一样，它存在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

我认为父亲参与的那次审判不仅是寻求惩处战犯，同时也向世界证明，即使全世界的复仇之声一呼四应，同盟军仍能遵守并坚守法律原则；文明的国家仍然会对大屠杀的凶手进行公正的审判，即便他的罪行令人发指。温斯顿·丘吉尔曾反对这一观点——并且支持草率处决所有战犯。那时从未同心联手抗击纳粹的苏联也赞成立即处决战犯。而当时众多知名美国批评家，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哈兰·费斯克·斯通，都把纽伦堡审判的构想斥

之为“杰克逊的高档私刑舞会”。其他人认为起诉应依据过去的事实情况来定，因为纳粹须以国际犯罪论处，而这些国际罪犯在过往的法律里则是一片空白。

最后胜出的论点基于两个强有力的观点。第一，通过审判这些发动战争的罪犯，将完整地记录下他们的滔天罪行，并向全世界展示，由此便可一劳永逸地向全世界宣布，文明的人类社会绝对不会宽恕这样的罪行；第二，在列举出被告们罪证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个辩解的机会，将彰显出同盟军所代表的高尚道德和法律基础。

正如杰克逊开庭所述：“为胜利而兴奋、为战争伤害而愤怒的四个伟大国家，如今虽然复仇的情绪高涨，但都自愿地将已落入己手的仇敌送予神圣的法律裁决。这就是人类理性行使权力的最好证明、人类文明的最高赞歌。”

父亲及其同道之人设立了一个明确且必须履行的标准，确切地说，就是一切暴行以及任何想要将暴行重复的尝试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当然，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当时都还太天真了。自从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后，在柬埔寨、卢旺达、波西尼亚、达尔福尔等地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以及暴行令我们深感震惊。然而，毫无疑问，纽伦堡审判不仅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成为一个语言标志。每当看到它，我们就会自省要齐力为侵略、种族主义和反人类罪行最大限度地负起责任。

所有这些我都已明了。但纽伦堡审判的具体内幕是什么呢？父亲是如何从一个地位相对较低的审判组成员，在人才济济的杰克逊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主要参与审理过程的人？整件事情对我来说似乎都很不寻常，同时也非常讽刺。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在审判之时所认识的父亲是我及我的兄弟姐妹们所不了解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曾在《第三帝国内幕》中将父亲描写为“尖锐而咄咄逼人”。在德国副总理弗兰茨·冯·帕彭——他是审判后三个无罪释放的被告之一——的回忆录中，用“礼貌、得体甚至友好”这样的词来刻画父亲，在审判结束时父亲还曾赠给他一盒哈瓦那雪茄。德国的《明镜周刊》杂志曾在纽伦堡审判六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再次提及父亲在法庭上所取得的成就：“当年纽伦堡法庭上的明星当属托马斯·J. 多德，他天赋辩才，能让证据‘歌唱’。他当庭出示了整个审判过程中最为骇人的一个证物，那是一

个被绞死的波兰人的干枯头颅。这个头颅是在集中营指挥官卡尔·科赫的书桌上发现的，科赫用这个头颅当镇纸。”

我很少有机会向父亲问及这些事情。大多数关于父亲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的情况，皆是从旁人口中得知的。例如，沃尔特·克朗凯特曾告诉我，希特勒青年组织的头目巴尔杜·冯·席腊赫当年就想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他指出控告他和他有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天主教徒，都领导了一些大型的青年组织（父亲曾有三年在国家青年管理局工作，期间作为领导负责了康涅狄格州的计划）。父亲断然否定了他的这种说法，“我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我对这些故事非常感兴趣，但由于环境限制和其他要先处理的事一直让我未能如愿。父亲在康涅狄格州从事法律工作几年后，凭他的实力在美国众议院占据了一席之地，继而顺利进入参议院。那时我也展开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先参加了美国和平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荒野山村中服役，继而到法学院学习。等到我有机会集中精力研究纽伦堡审判的时候，父亲已因心脏病突发而早早过世，享年六十四岁。母亲当然也了解一些当年纽伦堡审判的内幕，但她也在父亲走后一年半，因中风而与世长辞。

接下来的几年，我对自己得知的一切相当满足。因为我发现父亲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曾写过一些家信给母亲——我甚至还模糊地想起家里曾讨论过这些信件。然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只是习以为常地随便聊聊——从未在意过这些信件是否存在。

也是在那几年，我追随着父亲的足迹，来到华盛顿——成为一名众议员，之后也顺利地进入了参议院。正如父亲当年，我也参与到了国际事务当中。父亲常常以纽伦堡的亲身经历告诫国会要警惕极权主义的威胁，坚决反对政府采取的绥靖政策，而当年正是对希特勒采取了绥靖政策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父亲当然也影响了当时我在参议院的工作，而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上，我更注重拉丁美洲——与父亲关注的地理方向完全不同。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苏联也面临着解体。

虽然如此，父亲的人道精神——他认为压迫和自由的斗争将持续不断的观点——却一直深植我的脑海。早年父亲在餐桌上就对我们表达过这个观

点，这让我至今铭刻在心。当时我所不知道的，也曾以为永远不会知道的是那些父亲在纽伦堡战斗的细节。

关于纽伦堡题材的优秀书籍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而这些书籍中有很多是由纽伦堡审判的参与者所著。其他的则是由一些历史学家和记者所写。理所当然的，大屠杀单独成为一个文学种类。然而父亲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字功底的人，却从未写过一本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书，这确实令人费解。

随后我发现了父亲写的信。准确地说，是我的兄弟姐妹们发现了父亲的信。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发现。一则，父母的许多私人物品存放在罗德州岛家中的仓库里，但一场大火让其全部付之一炬；二来，据我所知，他们写给彼此的信件也都烧毁了。

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些信件并未存放在仓库中，而是保存在我姐姐玛莎家的地下室里。

1990年夏天，我决定在按时间顺序整理完这些信件之后开始阅读，如此我便能完整地体会父亲当年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这需要一点时间。我也发现了一些掩藏在这些信件中的历史纪念物——包括一幅由希特勒私人司机所描绘的柏林总部地堡的地图。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就双双自杀于此地堡中，而这幅地图则标记出了两人遗体被发现的位置。

终于，在华盛顿的公寓里，我静静地坐下，读完了所有的家信。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45年7月28日。读信时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日历——1990年7月28日，父亲正是在四十五年前的那一天，用钢笔在薄薄的航空邮件信笺上写下了这样的开头：“我最亲爱的，如果我的信过于冗长、过于详细，你会明白首先我是想拖延与你在一起的时光。我认为如此——因为尽管每天你都时时在我心中，但只有在写信的时候我才独自拥有你而不会被打扰。星期四的早上，你站在华盛顿联合车站的大门口，我从出租车的车窗向外凝视，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我的眼光一直追随你，直到你那美丽的身影消失在晨曦的曙光之中。”看完第一封信，想起父亲描写母亲的笔触，想着他是用怎样一种心情，在出租车驶离华盛顿联合车站时，透过车窗注视着母亲，我不禁潸然泪下。

父亲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征服了我。作为子女，我是了解父母的。

但我却不曾了解他们之间的爱如此深厚——如同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般浪漫、亲密。如果我曾渴望知道纽伦堡审判的内幕，那么我应该是得到这个机会了。

从伦敦寄回的这第一封信中，父亲提到了经历过无数德军火炮袭击后幸存的人们——这些人望着父亲的目光，父亲用“我无法直视”来描述。然后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信是他所创作出的一种即时性的亲密档案，记录了他事业开创伊始的年代和他人生中的重大事件。继续往下读，从这些信中，我了解到了以前从来没读到过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相关内容。最重要的是，在父亲的笔下，我看到了20世纪的重大事件是如何影响那些正义之士的一生——他们被派去将犯下滔天罪行的作恶者绳之以法。

从这些信件里，我初次了解到罗伯特·H·杰克逊那全是由上校组成的团队内部的斗争。起初，父亲对这个权威团体印象深刻，但是这样的敬畏之情并未能持续太长时间。他很快见识了他们的官僚作风，并写下了“无能之灾”四个字，以形容整个审理过程中努力是如何差点儿付诸东流，父亲的说法随后也得到了记者克朗凯特的证实，他是负责全场报道纽伦堡审判的合众社通讯记者。他告诉我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纽伦堡审判极有可能陷入混乱，同时也会无法实现在纳粹的迫害之后重树人道的理想。

大法官杰克逊非常欣赏父亲，并提到过父亲那出色的辩才。杰克逊当时非常渴望得到真诚且专业的帮助，最终他将团队里仅是普通律师的父亲晋升为他的左膀右臂，同时削弱了军队方面的参与作用。父亲的信里详细地描述了这段总是令人沮丧的时期——他曾对他最初所负责的领域非常灰心，并考虑向杰克逊法官提出卸任的要求。

我也在这些信中读到了对法官杰克逊本人的深入描写；父亲对于大法官的敬爱和崇拜随着审判的进行日益增长。他们不仅日复一日地一起在法庭工作，还要在每一个夜晚安排与各要人——皇室成员、国家首领、国际记者团的成员，和来访者举办餐会。在接下来杰克逊作为主控官，对赫尔曼·戈林进行的最难缠的盘问过程中，父亲对杰克逊的描述也是极其珍贵的——那也是正义的代价。父亲在评价时毫无保留。他也表达了自己对那些想要参加审判的犹太原告们的关心。我理解父亲的想法，因为他的关心是真诚的，毕竟当时犹太人被

冠上复仇者的角色，事实上他们是需要被保护的。即便读到这些矛盾的内容，我也很清楚，如果我和家人决定将这些信件公之于众，这些资料都必须保存下来。而且这些信件的权威性和历史重要性有必要受到保护。

父亲的其他观点并无太多争议，也没有太多先见之明，比如从个人情感角度出发，他对苏联团队中的一些成员是有好感的。但父亲不喜欢他们的主张，且认为苏联参与审判将是纽伦堡审判的致命弱点。纽伦堡审判旨在惩罚非人道的行为，而苏联曾大规模地犯下这类可怕的罪行。

在信中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惊讶的事实，包括父亲与被告威廉·凯特尔以及弗兰茨·冯·帕彭之间的关系。在信中，他暗示每天早上在开庭之前，他都会确认两人是否到场。我能理解，因为即便父亲对他们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在与他们的日常会话中，父亲也和他们日渐熟悉起来。

父亲的信，正如我所发现的，成了对当时发生的历史进行记录的一种尝试。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很多事件的全貌还没能展现在父亲眼前。正如当时他在纽伦堡挣扎着寻求自己的位置，甚至在非常渴望回家的时候，他信中描述的情形通常是带有浓厚的个人情绪。在给母亲写信的过程中，父亲明显地感到一种由衷的自由，这种自由来源于他与母亲之间那深厚的感情。因此，父亲在信中的表达通常都很原始，并未渲染任何他当时所遇的挫折。这些信件是历史的初次记录，与其他晚些时候出现的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资料书籍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之后的这些资料书籍的作者，不论是审判全程的见证者还是审判的亲身参与者，他们都是在知道事件结果的情况下写作的。然而父亲的即时描述会出现一些不一致的观点，或者有些观点他会在晚些时候有所更正。例如，父亲曾在有些信中过分批评了一些他自己也敬重的人。但这也是这些信件资料的一个特征——坦率、诚实和富有情感。

即便如此，从发现这些信件到后来我和家人决定将之公之于众，已过去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中，我们家致力于保护托马斯·J. 多德的遗物。在父亲作为参议员工作的最后那些年中，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令我们一家都很伤心——至今我们全家都认为当时针对他的谴责是毫无根据的。这不仅致使他的公共事业最终惨痛结束，也导致了他过早辞世。

但我们也知道父亲作为一名公务人员所留下的骄人纪录。作为一名为民

权而战的改革运动的斗士，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比如在纽伦堡审判之前，父亲在南方就曾起诉过三K党；在纽伦堡审判之后，父亲在遥远的国度与任何能让他回想起纳粹暴行的行为做斗争。为纪念父亲的工作，1995年我们在康涅狄格州大学建立了托马斯·J. 多德研究中心。中心在展开各种项目的同时，为人权斗士提供奖励。克林顿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曾在中心开幕式上发过言。威塞尔曾被关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言中他提到被解救出集中营之后，曾在法国的一个儿童之家生活，“非常渴望找到一个理由证明还有希望。我在意第绪语（一种犹太语）的报纸上读到关于纽伦堡审判的消息。关于纽伦堡审判还是有些事情是很难理解的。然而终于，凶手被指控谋杀。法庭的庄严肃穆，罗伯特·H. 杰克逊和托马斯·J. 多德的义正词严、赫尔曼·戈林的傲慢无礼、鲁道夫·赫斯面无表情的脸……”所有这一切，威塞尔说，都组成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法庭对抗。

就在多德中心繁荣发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将父亲所写的信件公之于众。然而就在我开始思考父亲会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目前美国本土发生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决定公开这些信件。父亲曾在纽伦堡审判上陈述过的法律规则，以及他曾在审判中有力表达过的一些标准，似乎已因一系列的过度滥用而迷失，我们的国家也犯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在纽伦堡审判时期的领导人中，有这样一种共识：从历史的角度，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他们负有独特的使命——将未来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提供援助，保证最基本的自由，确保战后的世界根植于一些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他们清楚用来帮助世界取得和平与正义的能力不只基于军事力量，更来源于我们所拥有的道德权威。这不仅仅取决于坦克和飞机，也取决于是否能让其他人认同我们的价值体系和理想。只有自愿坚持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我们才能成功地将其有效地传播开来。

马丁·路德·金曾言道，世间的道德弧线很长，但它总是朝向正义。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相信这一理想，但是最近诸多事件中，令人沮丧的过程却让人对此产生了质疑。

在过去六十年里，我们向纽伦堡审判中的前辈们学习良多。我们一直支

持正义。我们不曾挑起战争——我们结束战争。我们不曾拷问任何人——我们谴责他们。我们不曾厌恶这个世界——我们拥抱这个世界。

但是这样的情况却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了变化。有一种“世人逐渐开始怀疑我们反击恐怖主义的道德基础”的说法开始蔓延。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前国务卿以及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说的。

如果在六十年前，仅就“纽伦堡”一词便赋予了美国道德权威，以及正义的化身；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如今让美国丧失道德权威和正义化身的一个词出现了，那就是：关塔那摩。

我们也可以将道德权威和正义化身的坍塌归咎于一位美国总统的讲演。他站在白宫的玫瑰园中，试图让他同党派的成员认同他的主张：“不管《日内瓦公约》是否是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定义了人权的重要国际公约，美国应该重新解释它。”这是对正义的讽刺，我们锁定了恐怖主义嫌疑犯多年，但从未真正审判过他们。我们否定了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否定了正义的普遍权利。

现在，若处在纽伦堡的时代，这个国家决不应该在应对当前冲突的时候，选择改变永恒的真理。因为如果那样做，我们将无法战胜那些我们企图战胜的困难。最终我们失去的将比得到的更多。

我们当前的敌人将决不会顾及任何国际情感，或试图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们嘲笑我们的法律，正如当年赫尔曼·戈林曾嘲笑我们的条约和国际同盟“只是犹如厕纸”。

父亲在信中写道，留下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孩子们这么长时间，让他觉得非常不好受，但是“我正行使着正义，我确定我们不会为此遗憾。终有一天，我们做的事会成为人类为和平而战的伟大里程碑。这将是我最有价值的事……终有一天，我希望我们的儿子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为此深感自豪并受其激励。也许他们会成为律师，也许他们会利用我们在这里所开创的先例，运用我们在这里形成的法律条例”。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促使我们公开父亲的信件。这也许难以令人相信，但确实存在着一个对纽伦堡审判和其深远意义一无所知的世界。仍然有人否认大屠杀。即便纳粹自己都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文件证明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即便被告汉斯·弗里切曾言道：“天地间没有任何力量会为你的祖国洗去

这个耻辱，即便再隔几代人，再过几个世纪。”但仍然有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对此话题进行挑衅。

伊朗的总统，一个领导着七千万人民的国家首领，否认大屠杀曾发生过，并在2006年主持了一个国际“学者”的会议。这些“学者”们的共同点是轻视所有关于大屠杀的文史资料 and 任何其他能证明这史上最大罪行的证据。

《锡安长老会纪要》是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大欺骗，至今仍在许多国家深具影响力（例如叙利亚、伊朗，甚至沙特阿拉伯）。就在已经证实了这本书是个欺骗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些国家的政府仍然用它来达到宣传的目的。《我的奋斗》一书仍然在广泛流传。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的奋斗》在亚马逊网站上的销量超过威廉·L. 夏伊勒的杰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微小的差距仅次于对大屠杀描写最为详细的一本由安妮·弗兰克所著的《安妮日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相信纽伦堡审判真的什么都没留下。

在多德研究中心的开幕式上，埃利·威塞尔曾说到纳粹的目标“不仅是要消灭犹太人，更要根除他们的记忆。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在公布托马斯·J. 多德从纽伦堡写回的家信的同时，我和家人觉得我们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了另一件有说服力的人道主义证物，证明人类曾犯下的最糟罪行和人类所运用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目录

序言 / 1

第一篇 遗产

参与纽伦堡审判的那些人始终选择坚守法治，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甚至让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有权利全面审查他们自己的犯罪证据，并运用一切能运用的法律武器为自己申辩。

- 一 被破坏的纽伦堡 / 3
- 二 “恐怖的惩罚” / 14
- 三 种族屠杀的证据 / 26

第二篇 家书

格蕾丝，我最亲爱的，现在我正在纽伦堡这个死亡之城……

战争因此继续，当然过去它就一直存在。战争也带来了改变——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的一系列持续的改变。据我所知，战争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有那些愚蠢的人们都在谈论科学的进步，而这样的谈话常常让我觉得不寒而栗。我只想要和平，以及一个不太发达的科学。

- 四 无法直视的眼睛 / 49
- 五 废墟之上的囚犯 / 68
- 六 “最残忍的措施” / 94
- 七 觐见 / 120
- 八 晋升，并处理“混乱” / 149
- 九 暴行受审 / 165